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

王建辉

作者 王建辉,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编审;武汉,430077

关键词 思想史 新文化 新出版 近代报刊

提要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新出版的主潮和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是高度一致的。其因由在于有一群从事出版的有识之士应时代所需,以他们的出版活动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了有力的推动力量,这一部分近代出版从业者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也是一代新型文化人,他们将出版作为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一种职业和一种职志。本文以思想史和出版史相结合的视野,从八个方面初步论述了由这一群新型文化人所推动的近代出版与近代思想文化的诸多关联,揭示近代出版对近代思想文化的走向所具有的相当影响,以及对新文化新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出版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物质创造,出版物更是思想文化的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出版史的交合重叠,以社会转型的近代最为彰明。思想文化和出版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是至为密切的: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给出版以新的发展和推动;而出版对于思想文化的反哺作用和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则更为重要。但是,广义的出版(包括报刊图书的出版在内)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这种作用,还不曾受到时下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无多,实为憾事。本文算是做一点初步的研究

一、领袖人物的实践和论述

近代出版在兴起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和重视,表现为,行业本身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新闻出版职业也不为知识人看重。出版的作用得以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大致应当基于:(一)来自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的启示;(二)列强在中国用出版物扩大其意识形态影响,企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三)中国近代变法维新和革命的实践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对于出版的重视是经过近代几代知识精英

积淀下来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经验

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实践中开始懂得要重视办报刊,通过报刊来介绍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因此他再三声言他的报纸是以现代思想唤起民智。

1896年他就写作了一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著名文章,指出国之强弱在于它是“通”还是“塞”,新闻出版的功能就是在国家的“去塞求通”方面为其先导。^① 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他更以办报写文章宣传其改革主张为最大任务。^②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报馆之责任愈益重”。^③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其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民报》以宣传其思想主张。孙中山1918年在《建国方略》中曾论及印刷工业:“此项工业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④ 这里所说的印刷工业,实际上是近代出版业的代名词,这说明当时出版还处在“一词之立”的时期。在这份方略中,孙中山认识到我国现代印刷业尚处落后,要急起直追,与此同时,还设想与印刷工业相关的

辅助工业如造纸、油墨等,都要“归中央管理”,这表明孙中山对于出版具有意识形态特性这一点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给予高度重视。孙中山还特别注意出版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性,为此他曾指责过商务印书馆过于保守的出版方针。^⑤

在近代中国懂得出版重要性的,陈独秀算得上一个自觉的先行者。本世纪初他曾两次筹办《爱国新报》未果;1904年,陈独秀与友人办成《安徽俗话报》;1913年又鼓动友人汪孟邹办起了亚东图书馆(书店和出版社合一的文化机构);1915年他通过亚东与群益联系编辑出版《新青年》;1917年还为亚东图书馆扩大经营而与群益书社联合改组为一家大书店事宜,专程与书店老板一起到北京招股。也就是这次在京期间,蔡元培邀陈独秀入长北大文学院。即使在大革命将转入低潮时,他仍特意嘱咐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要紧的事是把书店的事做好,办书店不容易,不进则退。^⑥在他看来:“出版物是文化运动的一端,不是文化运动的全部”,“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的必要”^⑦。

可见,近代政治、思想和学术的领袖人物,无不重视出版。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毛泽东开办《湘江评论》,鲁迅一生办过7个出版社,都是将出版作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毛泽东写《〈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在末段把思想和出版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对思想与出版关系的认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二、出版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

中国近代,各种新旧思潮发生剧烈碰撞,社会、民族迫切呼唤新思想。近代出版物在中国思想运动的历程中,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媒体时代,扩大了人们交往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的思想革命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由于充当开路先锋,出版物往往成为新旧矛盾的焦点。“五四”时期曾经有过关于出版的斗争,1919年北京大学风波就是由出版物引发的。

《新青年》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20年代的作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如高长虹说:“中国之有显明的思想运动,是从《新青年》开始的。”^⑧当时的《民国日报》曾有文说:“自蔡子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而由于陈独秀、胡适等出版《新青年》等杂志,对封建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更被守旧人物视若虎狼蛇蝎。1919年3月4日,上海《申报》有消息说,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6日又报道说,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会所传流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又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氏辞退。尽管这个消息乃是误传,当时的舆论界对此仍然极为不满。上海《时事新报》的文章说:“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大学之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受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⑨这种争论最后导致政治行为的冲突,守旧的参议员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和《新潮》。出版物成为新旧直接对垒的战线。

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李大钊正是在《新青年》上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于1919年5月主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正是认识到报刊对于思想文化的革新作用,周恩来在天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时,就以“革新的同革心的精神为主旨”^⑩,以办刊方式宣扬思想解放。

在中国近代史上,报刊活动一向属于广义的出版的范畴,检诸近代报刊,可以发现,当时并没有一个新闻界与出版界的分野,而是将报刊都视为出版界之属。如《新潮》发刊词中也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作家高长虹在20年代出版的一部杂文集《走到出版界》,主要谈的即期刊问题。可见,他的出版界概念是包括期刊的。揭诸史实,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那时新报刊的创办,往往也和今日狭义上的出版界联系在一起,即通过书社书局等出版机构来做印刷发行。如《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⑪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交由亚东经销;“五四”以后,北京大学的《新潮》、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也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到亚东印行;孙中山的《建

设》杂志，则由朱执信交亚东共发行 24 期；^⑧《解放与改造》（后称《改造》）、《学衡》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⑨。高长虹的另一篇短文《小书局》，说到 20 年代“有一两种代表一个新的趋向的刊物出现时，常常是由小书局印行的。……这个事实已在说小书局在出版界曾经站在较进步的地位。”^⑩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进步的一个显明的特点，就是通过出版物的论战来促进的思想的前进和文化的质的飞跃。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即是出版物，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几次论战，双方无不借助于出版物来进行，这无需我们再做详尽的论证。因此，出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锋，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这个思想最为活跃的年代，思想界相对政权有较大的离心倾向的背景下，出版领域的查禁与反查禁斗争往往成为光明与黑暗、新与旧斗争的前沿。

三、出版界成为思想变革的直接策源地

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把本来应该居于后台的出版者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把他们从边缘地带推到了思想文化的中心，尽管在这中心，他们可能并不是很重要的人物。图书与报刊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有所不同。报刊的特性，借用鲁迅的话，可以说是思想文化的匕首和投枪，图书出版则形式厚重，思想比较深厚，是集束型的武器，因此它们作为思想的直接的策源者，对于社会反映之快、影响之烈、威力之大，都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王韬，也是中国最早的出版家，他与人合作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营出版机构——中华印务总局。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曾著有政论短文，汇编成《易言》，但一直“未敢出以示人”。1879 年他托人送请王韬批评，不料竟为付梓。这部书郑氏后来又有所增订，易名《盛世危言》，成为甲午战争前后最受欢迎的书，为维新变法作了最初的思想准备。这是出版家主动推进思想进程，出版成为思想的催化剂的极为有力的一例。

另如，商务印书馆的最早的一些编辑者，怀着敢为天下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出本世纪最早最新的一批教科书，由此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革新的思想发源地和思想中心，商务的编辑们就成为最早的教育救国的践行者，成为旧教育的早期掘墓人。

鲁迅的《阿 Q 正传》是编辑孙伏园引介出来在

报上连载的。有一段时间孙伏园外出，委托别的编辑与鲁迅联系拿取稿件，可这位编辑对于这部小说的眼光不是很高远，而鲁迅也有其他的事情急着做，于是将连载草草了结。待孙伏园回到报社，阿 Q 已经死去，小说不可挽回。不然《阿 Q 正传》或许还要更为成熟。

《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也都是出版者提出建议编辑出版的。尤其亚东图书馆于 1922 年夏出版《独秀文存》这样鼓吹革命的书，连陈独秀都感到“出版我的东西怕兮兮的”。事实上，当时北洋政府也确曾秘密下令禁止。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法所作的古典小说的考证，也是亚东引发催生出来的。亚东要出版标点本古典小说，请胡适作序，从而在学界创造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带来方法的革命。诚如几十年前《大公报》有文所说的，这些书在当时青年的思想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⑪

比图书更为快捷，反映时事更敏锐的杂志也在“五四”时期大批问世。他们都公开宣称其宗旨是“传播新思想”，“介绍新思想给国民”，“介绍新思想给世界”，“促使学术进步，以便运用研究和批评的思想去改造社会”^⑫。1915 年创办的《新青年》在其创办之初就定下“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的宗旨，^⑬更是哺育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近代出版格局中，关于思想文化的杂志总是居于出版的主导地位，也居于倡导思想变革的主导地位。

四、出版者和作者密切合作，成为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除了陈独秀、胡适们的功劳，个中也有出版者很大一份功绩。从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为刊物出版牵线搭桥，到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顶住发行不畅以至办刊赔本的压力，坚持续办，《新青年》的编辑者、出版者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出版者不仅和思想家们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最重要的是出版界中人如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两个主要人物陈独秀与胡适的牵线人，还长期充当着他们之间的联络人的角色，是陈胡二人友谊和感情的润滑剂。

中国主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在《北大月刊》的出版发行方面，给予了最优惠的条件。此外，商务还以它几十年的努力，从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了许多学者的研究。^⑭

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中,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虽未直接参与其事,却留心剪辑编出了一部《科学与人生观》文集,并请陈独秀和胡适各作了一篇序,让陈胡两人对于近代中国的这一大重要思想问题进行了不同观点的交锋。这部书相当于对这场论战做了一次小结。

作者和出版者的这一种合作结合了各自的优点:出版者对于读者以至市场的把握,显然要比作者(以及作者意义上的编辑者)更敏感,更在行,更有专业性,可以帮助思想家们达到占领思想阵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出版者与作者的结合,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从更广泛的范围而言,现代思想者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也常和现代出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现代出版给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基本的生存条件,著书常常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谋生的一种手段。这种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互利,更是思想的互惠。

五、开启民智,培育新读者群, 培养读书风气,塑造社会风尚

开启民智,是中国20世纪的一个世纪主题,维新派梁启超最先提出这个问题,而20世纪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开启民智至为重要。开启民智作为思想文化启蒙的社会基础工作,就是由出版这一中介实现的。出版机构通过出版许多于开启中国民智、发展学术文化大有益处的好书,培植了读者大众,为开启民智提供了社会土壤。

当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夏瑞方等几位创始人还是以一种不自觉的出版行为,推出《华英进阶》(《华英初阶》)等出版物时,他们不曾想到会在社会范围内,培养了近代最初的一批普通英文学习者。到了1902—1904年间,当商务的一批编辑人员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庄俞、蒋维乔等编辑《最新教科书》的时候,这个世纪的教育就播撒了将要发生深刻变革的种子。

亚东图书馆的前身芜湖科学书刊社,以出版《安徽俗话报》培育了安徽等地的白话文读者。后来亚东图书馆又以标点古小说著称一时。亚东的标点本出版,使新式标点影响面扩大,促使其在社会上更加通行,培育了20年代的一批古小说的新读者,从某种意义上,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16—19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新创办的报刊总数在1000种以上。^⑧如此广泛的新的出版物,既是新文化的重要成果,也形

成了最广大的读者群,为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正如1921年《新江西》创刊宣言所称:“发行本刊,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⑨出版者通过自己的报刊活动,把新的思想传播到读者和人民大众中,使这些读者成为社会新思想文化的受众,成为社会变革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先进的出版人正是借此将出版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社会责任。

六、出版是一种思想文化导向和选择

出版的社会意义,在于以物质的形式,以阅读的方式,给予社会成员以文化的引导和制约,使其获得在特定社会秩序下自我辨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出版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文化的导向和选择。一个时代的出版为了对社会负责,总得对文化作出选择并加以组织,这是出版的一个基本任务,也是出版之所以必要的一个基础理由。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文化,起决定作用的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出版者的一种能动的选择,以及他们对于时代的把握。在近代中国文化蜕变中,出版的主流是和时代发展一致的。这既是出版者的选择把握的功绩,也是出版对时代思想文化走向的正确反映。出版的这种导向和选择,塑造了时代的精神和信念和理想。

出版无小事,出版无枝节。就是最细小的环节都可能和思想的大局有关。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和陈独秀曾有过一次关于应用文改良的通信,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关于出版的印刷和版式问题的,如印刷用字、排版样式改竖为横等。^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是将这些看起来是枝微末节的出版细节,作为有关改革大纲的事体而予以重视的。又如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曾经谈到一件旧事,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反前儒向例,即与前人一向用经典的原文作为大字而将自己的文字作为小字不同,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的古人话语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样一种“以我为主”的出版格式的创立,表明五四时期人们思想的解放,深藏着一种新文化的选择和导向。

七、出版业内人士对于自己文化责任的体认

近代中国出版从业者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可

以说他们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型文化人，他们有志于出版事业，不仅使出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为社会公认的一种事业和职业，而且还有一种行业传统，即不十分宣扬自己的事业。尽管他们中大多数并不是社会改革的思想家，即使是韬奋这样的出版巨人，胡愈之也说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但是正是这些新型的出版人，领悟到“新书业与中国文化关系很密切”^①（汪孟邹语），领悟到出版者是时代的“眼睛”^②（高梦旦语）。近代出版从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近代社会才涌现的一代新型文化人。他们拥有社会良知和人文素养，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责任，是关心社会、政治、文化、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商人和文化人合一的新一代近代企业家。他们固然注重自己的经营利益，但如良友图书公司的伍联德所明确表示的：“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③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企业前途，从经济角度推动国家繁荣，而且“言商仍向儒”，具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德责任，把经营出版企业所赚取的部分盈余或积累的部分资源，回馈到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事业上，从而达到“利”与“义”的相互融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业的主要代表张元济就强调过：“本馆现在营业，宜处处从求进步着想。”^④这就是他们对于出版者社会责任的一种理解。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经营者的这一种体认，代表商务的出版方针，这就使得商务自身在全中国近代出版业中，必定处在最有重要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地位上。

出版除了直接与思想文化发生作用以外，更通过教育这个中介成为思想文化的温床。张元济就是一个自觉认识到出版的这种重要功能的智者。他投身出版业之初就找到了一种文化借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出版活动中找到自己做为一个教育者的公众角色。当1926年，他所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合办国民书局时，即于各大日报上刊出开业公告：“立国基础，端赖教育普及；知识津逮，全在教材精良。”另一个重要的出版人物王云五，在商务任上时写过《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1927年作）一文，指出，商务印书馆“以一私营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也不多见”，并从教科书编印、文体之改革、西洋文学之介绍、社会科学之介绍、自然科学之介绍、国故之整理、文化工具之研供七个方面，对于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文化进步方面所作贡献作了充分的论述^⑤。其论也宏，其情也切，即

是对商务前三十年历史的很好的总结，也是对出版者自身责任的一种全方位的自我反思。出版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出版从业者本身应当是精神富有者才能胜任，他们本身要有高度的文化追求才能进行文化的创造。

八、出版的进程就是思想史的进程

近代社会的变革，本质上体现为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考诸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近代出版的历史进程和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是高度一致的。近代出版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和推进器，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文化质变中，出版业自身只有适应近代变革才能生存发展，并且也确实实现了自身的近代化；其二，近代出版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成为了近代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促媒和助动器，在总体上成为光明的使者。孙中山曾经论述出版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的推动：“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⑥，揭示了近代出版与思想学术文化的关系。

在思想文化史的进程中，出版物常常成为一个思想时代的象征。20年代上半叶，胡适曾对陈独秀说过，20多年来，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一个是《时务报》，一个是《新民丛报》，再一个是《新青年》^⑦。依胡适的意思，这样三个时代显然是思想文化的三个标志。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芽。”^⑧1936年，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联合重印《新青年》，蔡元培和胡适都分别题词。蔡元培的题词是：“新青年杂志为五四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或喜也。”胡适的题词则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⑨可见学界对于近代出版作为思想文化的触媒和载体，抱着认同的态度。

注 释：

- ① 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年版，第26页。
- ② 汪向荣：《留日学生对出版事业的影响》，载《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 ③ 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第155页。
-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 ⑤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 ⑥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32页。
- ⑦ 陈独秀:《新出版物》,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 ⑧ 高长虹:《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载《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第141页。
- ⑨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 ⑩ 刘宏权、刘洪泽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 ⑪ 朱洪:《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中国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 ⑫ 汪原放:《陈独秀上海亚东图书馆》,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 ⑬ 李泽彰:《三十五年中国之出版业》,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7页;《学衡杂志简章》,载《国故新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 ⑭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第17-18页。
- ⑮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72-76页;萧聪:《汪孟邹——出版人物印象之一》,《大公报》1947年8月10日。
- ⑯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9页。
- ⑰ 《通信》,载《新青年》第1卷第1号。
- ⑱ 唐振常:《张元济与蔡元培》,载《识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⑲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7页。
- ⑳ 刘宏权、刘洪泽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第221-474页。
- ㉑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75页。
- ㉒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8页。
- ㉓ 《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页。
- ㉔ 伍联德:《再为良友发言》,载《良友》第36期,1929年4月。
- ㉕ 《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65页。
- ㉖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 ㉗ 孙中山:《民国周年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1920年2月9日。
- ㉘ 朱洪:《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130页。
- ㉙ 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第2页。
- ㉚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4页。

(责任编辑 张琳)